

毛泽东诗词中的群众语言

毛泽东历来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向现实生活学习语言。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这么强调,自己写文章、作报告乃至写诗填词都大量运用群众语言。他的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诵、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采用大众话语方式写诗

谚语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简洁短语,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谚语流传在老百姓的口头上,有广泛的教育作用,如“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人心齐,泰山移”等等。正如元代房樾《读杜诗》所云:“欲知子美高明处,只把寻常话作诗。”谚语入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可以使诗词语言变得生动鲜活。

《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自注:“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对“武昌鱼”注释道:“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是化用。”“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既体现出长沙、武汉不同的风土人情,更表达了毛泽东从长沙前往武汉畅游长江的急迫心情。《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出自清代《增广贤文》中的旧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登山本是寻常之事,而“莫道君行早”却写得颇有气氛,也显示出毛泽东的兴致很浓。《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句,化用民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仅极大地增强了谚语本身的表现力,而且与开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前后呼应。

如果说上述的引用属于照搬套用的话,那么在《十六字令三首》的“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之中,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附作者原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毛泽东借用民谣“离天三尺三”成句,极为夸张地写出山势的高峻,又反用“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之句,用以形容红军非但没有低头下马,反而快马加鞭,飞腾而过。活用一句民谣,于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气概跃然纸上。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的不三不四的词句。”“适合大众需要”“反映民众生活”,是毛泽东一贯的文艺思想,这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诗学主张中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生动活泼、言近旨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将口语入诗。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代王昌龄《从军行》“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诗句略显古板,颇似呈送上级的战报。而毛泽东则把着眼点放在欢呼雀跃的红军战士身上,鲜活地展示奔走相告的喜悦情景。《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既写出反动军队“步步为营”的狰狞面目,突出蒋介石屡战屡败的可怜嘴脸,更反衬出革命军民庆贺胜利的欢欣鼓舞。《七律二首·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就像民间艺人在说评书,描绘出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动场面。《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不爱红装爱武装”,用平易近人的口语,生动刻画出新中国妇女英姿飒爽的崭新风貌。

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时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毛泽东诗词属于古典诗词,但少见艰深语言,也从不用深奥典故,而是嵌入了大量大众化的常用词和习惯语,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看万山红遍”“看红装素裹”,像是游客在描绘观感。“苍龙”“蚂蚁”“苍蝇”“小虫”“蚯蚓”等,都是人们痛恨和鄙视的邪恶势力。“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冲霄汉”,“天兵”是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的形象叫法。“黄洋界上炮声隆”“百万雄师过大江”,俨然就是老百姓对战争风云的直白描述。“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好像老少爷们在谈天说地。“吴刚捧出桂花酒”“今日欢呼孙大圣”,即便神仙都是些人们熟悉的人物。“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工整典雅,但也类似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春联。

古人酒杯名称有讲究 “爵”“觚”“觶”意在节制钟葵



商 目云纹铜爵。

古代酒器造型 容量都有严格规定

展品中,最吸引观众眼球的是各种造型奇特、纹饰精美的酒器,如铜爵、铜觚、铜觶、铜盃、铜壶、纯银酒瓶、银鍍空套绿玻璃葡萄酒瓶等。

这些酒器主要分为两类:饮酒器和盛酒器。爵、觚、觶等是饮酒器,盃、壶、瓶等是盛酒器。

饮酒器就是酒杯。很多人在欣赏这些古代酒杯时,心中有疑问:古人为什么给酒杯取这些稀奇古怪的名字?“爵”“觚”“觶”是什么意思?

这是因为这些用青铜制作的饮酒器在先秦时期是礼器,是贵族之具,多用于王室贵族间的宴飨、朝聘、会盟等礼仪交际场合。而作为礼器的饮酒器,必须要有名称才能加以区分。所以不仅每种饮酒器的名称都有特殊含义,且其造型、容量也有严格的规定。此外,什么人使用何种饮酒器也有不同。

先看造型。爵,前有流(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下有三足,一侧有鋡手,流与杯口之间有柱,整体造型像一只雀鸟。

觚,长身细腰,圈足和杯口均呈喇叭状。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线条优美,纹饰繁复华丽。

觶,圆腹、侈口、圈足,形似瓶,大多数有盖,有扁体和圆体两种。造型稳重大方。

容量方面,《周礼·考工记·梓人》贾公彦疏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当时的一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可见觚的容量比爵大,觶的容量又比觚大。

名称含义。《韩诗》云:“爵,尽也、足也。觚,寡也,饮当寡少。觶,适也,饮当自适也。”

对“爵”的含义,《说文解字》另有一说:“爵,礼器也。象爵(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意思是,爵是一种礼器,形状似雀,爵中有鬯酒,字形中的“又”表示用手持握,以便饮酒。爵的形状之所以像雀,是因雀的鸣叫声听起来如“节节足足”。因此用爵饮酒,也要节制和知足。

此外,《字汇》《埤雅》也认为“爵象雀”有警戒意义。《字汇》说:“取其能飞而不溺于酒,以示儆焉。”《埤雅》说:“一升曰爵,亦取其鸣节,以戒荒淫。”

以“爵”为名,提醒饮酒要节制;以“觚”为名,提醒饮酒要“寡少”;以“觶”为名,提醒饮酒要适量。可见这三种饮酒器的名称,都有警戒不可溺于酒之意。

有学者认为,古人这样解释饮酒器的名称,是鉴于商纣王纵酒的历史教训,从而制定以节制为宗旨的饮酒礼仪,并从酒器的大小上加以规范。



商 铜觚。

中国酒文化的独特之处

古代的酒度数较低,酒量好的人饮一爵一觚应该没问题。但饮一觥以上,就超过600毫升,已经过量,所以古人强调必须要节制。

先秦时期比觥大的饮酒器,还有角和散。

角,形状像无柱的爵,流和尾同为尖锐状。散,即罍,喇叭状,形似爵而大,但无流无尾,仅在口沿上有两柱。

角的容量是四升,散的容量是五升。这两种饮酒器的名称也有特殊含义。

《韩诗》说:“角,触也,饮不能自适,触罪过也。散,讪也,饮不能自节,为人所谤讪也。”以“角”为名,是告诫人们饮酒要适量;以“散”为名,是告诫人们饮酒要节制。

正因如此,古代的青铜酒杯以小为尊,以小为贵。连酒杯的名称也有如此多的讲究,这就是中国酒文化的独特之处。

从民歌中汲取丰富营养

1957年1月《诗刊》杂志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作品时,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等人写的信中指出:“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据梅白回忆,毛泽东曾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毛泽东认为古典诗词在诗体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他也深刻地认识到,要使古典诗词艺术之树常青,“一万年也打不倒”,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革”。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新诗时说:“中国诗的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965年7月21日,他在《致陈毅》中写道:“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民歌来源于民间,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反映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语言应用生动活泼,凝练传神,多以人民群众的口语入歌,体现出鲜明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

其实,新诗旧诗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单纯从形式上判断新旧。毛泽东诗词只是采用了旧体诗词的形式,但作品所呈现的内容、思想、感情、语汇则是与时俱进的。《杂言诗·八连颂》以三言为主体,类似于三字经,朗朗上口,其中“拒腐蚀,永不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该诗以其通俗浅切、铿锵有力的风格,明白如话的民歌情调,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应。这首诗是毛泽东在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一次积极探索。

毛泽东重视诗词的语言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在致力于解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无疑为古典诗词推陈出新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据《学习时报》)

红色宝库 奋斗百年

霎时间,2008名演员、2008面缶,波光律动、人缶齐鸣,光阴与时空交错的击缶盛宴,迸发出动人心魄之音。

10、9、8、7、6、5、4、3、2、1……雷鸣般的击缶声中,全场观众随着数字的变换齐声呼喊。20时整,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北京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奥运缶缶出民族精气神

岁月如水。人们不会忘记,那是一届惊艳世界的体育盛会,也成为让世界充分感受中华民族精气神的窗口。

缶音悠长。一面北京奥组委提交的“奥运缶”,已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让更多人得以近距离领略它的风采——

这面缶体态硕大,色泽呈现金属质感,装饰有中国古代传统纹饰。在开幕式演出现场,使用它的演员需要做出1000多个规定动作,才能完成表演;缶上的LED变换不同图案,展现出别样风采。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奥运缶不仅是一件表演道具,更是一个文化标志。

缶,印刻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既是盛食物的器物,也是可以敲击伴奏的民间乐器。奥运缶的原型,就是湖北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造型精美的青铜冰鉴缶,展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作为现代科技与古代神韵的凝结,无论是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还是“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的中国理念,都在华美豪迈的缶击声中充分呈现。

从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提出“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到北京奥运会召开,中国人的奥运梦经历了整整100年。追梦圆梦的历程,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生活幸福的道路相伴而行。从落后到发展,从贫穷到小康,从封闭到开放,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如今,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入关键时期。相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将向世界展现新的精彩,推动世界冰雪运动发展,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据新华社)

拾遗

大雅之堂与大雅

中国人有句自谦的话:“难登大雅之堂”。出自清朝文人袁枚的《与陈刺史虚斋》:“未登大雅之堂,还望刺史陶冶而成全之。”那么,什么是大雅之堂,大雅之堂又在哪儿呢?

要了解大雅之堂,先要知道什么是大雅。年少时曾看一古装剧,剧中有人出上联“三光日月星”,难坏了满朝读书人,主角随口对道:“四诗风雅颂。”众所周知,《诗经》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那四诗之说从何说起呢?原来,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所以说四诗没问题。雅指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在周代,周天子和贵族举行宴会时,把《诗经》中“雅”这部分作品做了分类,将其中比较回避民间哀怨的诗歌命名为“大雅”,更适合在宴会上演出;另一类较多涉及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种种不平甚至是抗议的作品,被归为“小雅”。这才有所谓小雅和大雅之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有高低大小的区别。其实,现代学界认为,《小雅》的部分诗歌,其内涵的丰富性远超《大雅》。

不过,古人似乎更认同大雅,大雅成了个专有名词,用以称德高而有才的人、学识渊博的人,也可指高尚雅正。明朝的蒋灿《题杜少陵像》诗云:“大雅长往矣,遗容后代看。”尊杜甫为大雅。现代汉语里的不伤大雅,其中的大雅指的就是高尚雅正。

说完大雅,我们再看大雅之堂。这个词可以指高尚雅致的地方,也可以形容某些被人看重的、不“粗俗”的事物,似乎是说已经高雅到可以登堂入室的地步了。那究竟有没有大雅之堂呢?严格来说,大雅之堂只是个比喻,并不实际存在。大雅堂倒是有几处,像北京大学和成都杜甫草堂都有座大雅堂,最出名的还是四川丹棱县的大雅堂。这座大雅堂建于北宋年间,是集唐代诗圣杜甫诗和北宋书法大家黄庭坚书法艺术为一体的诗书堂,堂内珍藏诗碑三百余方。黄庭坚为之题名“大雅堂”,并作《大雅堂记》。(据《西安晚报》)

曾国藩:试制“防弹衣”

近读《曾国藩日记》,看到一段曾国藩试制防弹衣的记载:“国藩初办水师时,尝博求御炮子之法。以渔网数层,悬空张挂,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以絮被渍湿张挂,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以生牛皮悬于船旁,以藤牌陈于船前,不能御也;又作数层厚牌,以竹鳞排于外为一层,牛皮为一层,水絮(按:即渍水的棉絮)为一层,合而成牌,亦不能御也”“鸟枪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御之,抬枪子,劈山炮子,凡大如黄豆以上者,竟无拒御之法”。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领导的湘军,特别是水师,在河道中无遮蔽,船与人的防御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看以上所引日记,可以知道曾国藩也很注重试验,只是受科学和新材料所限,试来试去,竟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防弹材料。

曾国藩试验失败后,束手无策,在日记中写道:“近时杨军门载福等,深知炮子之无可御,遂摒弃渔网、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此可谓无法之法,悉听天命了。(据《天津日报》)

李苦禅作画

一日,正在家里创作的李苦禅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后看到一位从外地起来的商人,对方开口想让李苦禅帮他做100个扇面。虽然对方的价钱非常不错,但给出的时间却非常苛刻,要求一周之内便要提货。李苦禅思忖了一下,还是答应了这笔买卖。

将商人送出门后,李苦禅明白,如果按照往日的作画方法,一个一个地去画扇面,少说也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果真的这样去做,到约定的时间肯定无法交差。不过既然已经答应了对

方,自己就要想办法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思来想去,李苦禅最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先是用半天的时间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这个夹子的大小与所要画的扇面吻合。接下来,他又提前找出100个需要画的扇面放置旁边,等一切布置停当后,李苦禅便开始作起画来。

如果第一笔画的是山石,那么,李苦禅会随即在其余99张的扇面上也画上山石;而下一笔要是画花鸟,相应地,他也会在其余99张的扇面上也画上花鸟。这样的画法不仅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而且画起来不用太费脑子。

就这样,李苦禅连续工作了好几天,终于在约定的时间内交货。那位商人也非常爽快,不仅按规定支付了全部的费用,而且还多给了10把扇子的钱,他觉得李苦禅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内心既敬佩又感动。

(据《人民政协报》)

(据《广州日报》)